

計然其人其事及其思想

陳 飛 龍

計然，名字的寫法不一：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和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都作「計然」；吳越春秋作「計碗」；越絕書作「計倪」；太平御覽卷七十四引魯連子作「計兒」。有人以為「計」不是姓氏，只說他精於「計學」而已。又因為他曾一度離開越國，「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漁）三邦之利」，和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的經歷相似，以為實際就是范蠡的別稱。這些誤傳，都不足取。

據三國魏劉劭、王象等撰，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孫馮翼輯刊問經堂叢書本的皇覽、和清黃奭所輯錄黃氏逸書考子史鈎沈當中的魏皇覽都說：「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如此概括性的簡介，一直到唐顏師古注漢書時也都採引印證。現在再依據劉宋裴駰史記集解，得知計然是齊國葵丘（今山東臨淄西）濮上（濮水濱）人——這是個開發較早、進步較快、文明污染又較為深重的地區。他生死的年代都不可查考，大概比孔子生得晚一些；比墨子、李悝却要早一些。姓辛氏，字文子，先祖原是晉國逃亡在外的公子。對經濟事務瞭解得很多，有傑出的造詣。

據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以下簡稱「吳越外傳」）第九，說他能「仰觀天文，集（收集資訊）察（觀測星象）緯（天象中位置變動叫緯）宿（列星），曆（推測星辰運行，以定歲時節氣）象（觀測星象）四時，以下者（居於下方位的星辰）上虛（移居於上方位），設八倉」。可知他對於天文星象很有研究，並且懂得把它們應用在實際事務方面。他和當時許多的青年才俊一樣，四處旅行，謀求發展，到了越國以後，或許透過位居要津、深得勾踐信任的范蠡所推薦，在越國朝廷中做了個品秩不高、但地位還算重要的大夫。算起來比較年輕，但由於他從齊國首善地區來，對齊國發展的經驗有深切的瞭解，一般學識也還算豐富。或許由於他在經濟問題方面多具獨特的見解，范氏對這位受他照顧的人十分尊重，遂以師禮相待。

計然其人其事及其思想

據吳越春秋卷七勾踐入臣外傳：勾踐五年五月，越王入吳爲臣，羣臣由文種、范蠡兩位大夫率領，來到浙江（錢塘江）江濱會稽城外替越王餞行。越國的軍士也在江岸上游固陵（范蠡訓練士卒的城壘，後稱「西陵」）地方，列陣遙遙相送。文種代表致祝辭，進肉乾，行酒二巡以後，越王擡起頭來，對天嘆息一聲，然後慢慢舉起酒杯，禁不住流下淚來。文種只好再進祝辭，說：「大王德壽，無疆無極；……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再喝上一杯酒），請稱（請准高呼）萬歲。」越王感傷，說：「……今遭辱恥爲天下笑，將（其；那是）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我的過失在那裏），願二三子論其意（疑慮）。」文種、范蠡和大夫扶同（史記作逢同）先後都講了話，接著發言的就是大夫計然，他說：「今君王國於會稽，窮（困厄）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悵（心存怨恨所表現出來的剛強不過）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爲謾辭譁說用（用恣語誇言）而相欺，臣誠不取（不敢苟同）！」越王連忙分辯說：「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綴輯）焉！」

於是大夫臯如、曳庸（左傳作扈庸；國語作舌庸）都極力贊美文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實在是「國之梁棟，君之爪牙」；並且以爲他是「夫驥（千里馬）不可與匹馳（相併奔馳。匹，對方）；日月不可並照（同時照射人間）」，主張在越王去國期間，委文種以國家重任。果然如此，「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多慮，不願文種有了領袖羣倫的實質地位，再在名分上享有尊貴的官銜，心中只肯接受「集體領導」、「權力分散」的模式，於是說：「……今事（因特別事故）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依從，遵行；探行）也，亦子之憂也（先生們該爲我分憂的呀）。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留在國內的臣民）盡忠，亡者（前往吳國爲臣的人）爲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聚）一離，令孤懷心（中心思念）不定也。夫推國（推讓治國的權力）任賢，度功（計慮功勞）績成（考核成績）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本分）者臣之職也。吾願（但；只希望）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算是）委質（本指「奉相見之禮」，這裏作「當面拜託；講）而已。於乎（嗚呼）悲哉！」

計然是個敢於進言的人，他看出越王瞻前顧後，態度曖昧，直言反駁道：「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周文王）之（往）殷，委國於二老。今懷（歸；來）夏（喻「吳」）將滯（遲留），志在於還。夫適市（指「因罪遠謫於市者」）之妻，教嗣（後嗣）糞除（清除糞便）；出亡之君，勅臣（誠告臣屬）守禦。子（子爵，稱越王）聞以事，臣謀

以能。今君王欲上之所志（遠已之私意），各陳其情（實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

這裏引述了上面這幾段話，寫了近千字，目的只在說明：一、句踐入吳之先，計然已經到了越國，在越國居於大夫的職位；二、越國朝廷中，當時只設大夫，沒有所謂「相國」之類的稱謂；三、大夫中地位比較高的是文種和范蠡；四、計然在大夫中，也不是完全沒有地位的人，尤其敢於講別人不敢講的話。

據越絕書卷九、越絕外傳計倪第十一，句踐征吳大敗、向吳王求和、得遂所願以後，整日裏棲息在會稽山中，臥薪嘗膽，立志要擊敗強大的吳國，報復大仇，雪除深恨。爲了達成這項願望，有一天召集羣臣，脅迫著要他們和自己共同舉行盟誓。句踐說出心事以後，却發現臣屬們一個個表情漠然，誰都不作反應，因而感歎地說：「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然官階低微，也不年長，却抬起頭來答道：「殆哉（真危險呵）！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接著又說：「（從理論上說，）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可是事實上，）王愛所輕（所當看輕的官位和財幣），責（求）士所重（士人所重視的生命），豈不艱哉！」

越王聽了，連忙拱手拜謝，並且要求計然到前邊來，繼續回話，計然說：「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闔（開）門固根，莫如正身（使自身的作爲合乎正道）。正身之道，謹選左右（謹慎選擇在身邊幫同決策的人）。左右選，則孔主（光大君主的構想和決策）日益上（升）；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指「選」和「不選」）貴賤（誠信）浸之漸也。顯君王公選於衆（從羣衆中公平選擇）。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給與）居家（居於卿、大夫的地位）；使邪僻（乖戾不中理）之氣，無漸以生（不能逐漸滋生）。仁義之行有階（有登進的階徑）；人知其能（人人知道自身能力所在），官知其治（官吏認清職責所在），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用語言加以攻擊或贊揚），無功者不敢干治（參與政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因聽從人員的進言作決定），不問其先（不考查先前的出身），說取一焉。是故周文（文王）齊桓（桓公）躬於任賢；太公（姜尚）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

越王聽了這番言語，勃然大怒；計然却全不理會，仍然接下去說：「齊威（則）却除（免察）管仲罪大（助公子糾，射小白中鈞的大罪），責任之（將責任加在他身上）至易（簡易；單純），此故南陽蒼狗（即「南陽蒼狗」。南陽，春秋時屬於魯國，因在岱山之南而得名。蒼狗，喻變幻。四字比喻齊國國力擴展到魯國境內，獲得很大的成就）。太公九十而不伐（不誇功），禰溪（太公未遇文王前垂釣的

計然其人其事及其思想

地方)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猶「呼」)仲(仲父，桓公對管仲的尊稱)，二乎尙(原文作「仲」，依上下文意改。爲父，文王對太公的尊稱)，斯可致王(建立王者的事業)，但羈(僅僅稱霸)何足道？……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依式構造)，倚(依照)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羞。君王察之(願君王看清楚)！」

用人爲一切行政的基礎，這番話，不但說明信任臣下的重要，並且暗喻越王對吳國作戰失敗是不聽從范蠡諫言的結果。接著，計然更明白地說：「故賢君用臣，略責(求)於絕施之職(獨負施行職責的人、或機構)而成其功(使之完成功業)；遠使以效其誠(派到國外去做使臣，看他貢獻的忠誠是否產生效果)；內告(告語而不使人知)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考慮周全)，不肖(不賢)者無所置(安身)。」(吳越外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可參見)計然是善於言辭的人，懂得如何口角春風，順便捧一下別人的場：第一句似乎專指范蠡；第二句似乎贊揚文種；聽了這番言語，句踐只有大感慚愧。

越王問計然治國的途徑，他就提出了「察好尙、貴流通、尙平均、戒停滯……」等十項政策，其中除了「察好尙」一項，不限於經濟事務以外，其餘「貴流通」、「尙平均」、「戒停滯」等三項，都和「貨殖」息息有關。想來，應該就從這時候開始，計然和范蠡、文種三人開始共同輔政。在句踐身邊，這三個獻策、輔政的謀士中，有人說，范蠡曾師事計然，計然必然居首，范氏自必居輔；又有人說，文種年長，據越絕書卷六、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范蠡在楚國做「結僮」(「結髮爲僮」。是說雖已成年，却仍作童子的僕役工作)的時候，文種已經以「大夫」身分做了「宛」邑的宰，既富行政經驗，在越王朝中的地位必然比范氏重要。可是據吳越外傳，范蠡隨越王自吳返越，居「相國」的職位，文種和計然却還都是普通大夫。似乎由於范氏心胸開闊，從不忌才，和文種又志趣相投，相交已久；文種對計氏的看法和范蠡應該相去不遠。總之，三人相處，想來必定十分融洽。據瞭解，計然的特長和興趣，偏重在國計民生方面。越絕書卷四、越絕計倪內經(以下簡稱越絕內經)第五中，越王說過「吾聞先生(指計氏)明於治歲(穀成熟)，萬物盡長(增產)，欲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經常的教導)」的話，可以證明。范氏善於考慮，長於決斷，才能偏重在軍事方面。國語越語下記范氏應對越王的話中有「四封(四境)之外，敵國之制(對敵國的制斷)，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四句，說的正是此意。文種在行政處理(國語越語下記范蠡對越王說：「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正相符合)、折衝樽俎方面

，經驗較多。他受命「行成於吳」（到吳國去進行求和）就是實例。越國由於君臣上下一心，經過了十年的生聚，國力發展已經達到十分富厚的地步；然後再作十年的教訓工作，又訂定重賞厚賂的種種條例，充分激勵士氣，人人同仇敵愾，個個不顧生死，勇猛向敵，終於一舉擊敗了強勁的吳國。

句踐攻吳之前，記載中已不見計然的踪影；越王受封爲「伯」歸來以後，對舊臣行封賞，作處置，也沒再提到計然，此人必然在滅吳之前，早已辭世。計氏死後，沒有著作流傳於世。他的言論中有關經濟的部分，大多摘要見於史記貨殖列傳；至於詳實的言辭，尤其是一般性質的，散見於東漢禮暉的吳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絕書中。

以下次第敘述計然在經濟思想方面的理論。

計然是我國古代少數計學（經濟學）家中比較傑出的一位。他的經濟言論雖然不多，但都非常精闢審慎。一般說來，他所推行的政策，以小國爲其實施範圍。從土地、人、和鄰國的關係、以及地理位置等項來衡量，越國和當年的齊國都不能相提並論。在時間上，計氏要比在秦國推行「重農政策」的商鞅早生一百年以上。兩人各自推行的開發計畫，從規模上著眼，前者也比後者要小上許多。

越王的恥辱從戰敗中得來，因而認定只有從擊敗吳人的軍事行動中才能完全洗雪。句踐所以要力謀「富國強兵」，目的似乎不在保境安民、改善人民生活，却在於澆雪自身所受到的那許多屈辱。他因爲要從事戰爭，就不得不設法增強國防力量。人民是軍人的基礎；戰爭是雙方國力的總競賽。強兵不得不從富民做起。在計然對越王所獻的十策之中，「察」人民的「好尚」，就成爲十策中最基本的一項。免於飢寒之苦，無疑是人最基本要求。這項最低的要求，要想全面達成，可也並不那麼容易。因而衣食不缺，往往也成爲人們最大的願望，也就是說，那才是人民的基本「好尚」。

計然在經濟思想上的貢獻，範圍十分廣泛。現在歸納成五項，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項——經濟循環說

經濟現象變幻無窮，既不能久盛而不衰，也不會久衰而不盛，常常依照循環的法則發展。計氏在越絕內經中說：「聖人早知天地之反（天象和農產間，有循環週迴的道理），爲之預備。」「反」，當「返還」講。「聖人」所知道的「天地之反」，實在就是「天

計然其人其事及其思想

上的「星象」影響著「地」上的「農業生產」，發生「穰」、「毀」、「康」、「旱」的變化，每十二年一循環（返迴）的道理。

同書中，計然又說：「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和「妖」通，災害）祥。」要知道，國家所要「備」的「妖」，指的正是十二年一循環的「毀」、「康」、和「旱」；所要「備」的「祥」，指的正是「穰」。

史記貨殖列傳中引計然的話，說：「故歲（太歲；歲星）在金，穰（豐收）；水，毀（歉收）；木，饑（荒年）；火，旱。」類似的話，越絕內經中作：「太陰（「太陰」實際上就是「歲星」的化身，想像中它按反時鐘方向，照子、丑、寅……的順序運行；和歲星的按順時鐘方向，照亥、戌、酉……的順序運行，正好相反。「太陰」和「歲星」名稱雖然不同，實際所指却並無分別）三歲（中、西、戌）處金，則穰（豐收）；三歲（亥、子、丑）處水，則毀（歉收）；三歲（寅、卯、辰）處木，則康（同「穰」，是「米皮」。喻歉收）；三歲（巳、午、未）處火，則旱。」兩處的用辭繁簡雖然不同，內容上可沒有甚麼差異。意思都是說：人間的經濟盛衰，尤其在農業生產方面，和「歲星」的運行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連，每十二年循環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史記貨殖列傳引文作「木，饑」，而越絕書引文作「處木，則康」。「饑」，就是「饑饉」；和「康」，同「糠」，是「穀皮」的意思；如果把「下文」（「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連在一起看，兩相比較，應該以越絕書的「康」字為是。關於這點，後文尚將提及，暫且說到這裏。

有關農業穰毀定期循環的學說，有人以為在春秋末期頗為盛行，並非由計然一人所創建。但由於計氏的身世資料不全，他先人是晉國逃亡的公子，在齊國定居，子孫繁衍的情形，今人一無所知；當時五行之說正盛，在找不出具體證據之前，排除計然就是創立此說的人，似乎不十分恰當。

所謂「天道循環」，含義十分廣泛，當然不以農業生產為限，其它如工業、政治、社會等許多方面，情形似乎也都如此。政治家既然可以根據目前的盈、虧現象，預測未來的正負演變，因而也就自能早留地步，先作準備。

十九世紀末期，英國經濟學家介達士（W. S. Jevons），去世後的第二年，在貨幣與金融的研究書中，發表他所創立的「太陽黑子說」（Sun-Spot Theory），以為：由於太陽中黑子的出現非常有規律，大約十一到十三年成一周期。每逢黑子出現，地球上的農業收成必然發生荒歉現象，自然也就引起經濟上的衰退事實。這種學說，和計然的

人間農業盛衰，受歲星運行的影響，十二年一循環的說法正相吻合。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經濟學家中，如法國的翟格拉（C. Juglar），在他的法英美商業恐慌與其循環書中；美國的熊彼德（J. A. Schumpeter），在他的經濟發展理論書中；都曾對經濟循環理論加以肯定，事實上也都採用了計然所創立的經濟學說。至於稍早於翟格拉和熊彼德兩位的介達士，不管他的「太陽黑子說」能不能成立，暫不計較，他是西方世界中第一個實際推崇計氏學說、並且企圖為它找尋理論根源的人。經濟循環說由計然創立，五百年後又經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所引用，在時間上，比西方經濟學家介達士要早上兩千五百、或兩千年左右。我國的計然，無疑是經濟循環學說的創始人，在經濟思想發展史上，道道地地是位先驅人物。

接着，史記貨殖列傳又引計然的話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意思說，歲星運行到「金」和「水」的部位那六年中，人世間的穀物成長會有一年「穰」；也就是大「豐收」；歲星運行到「木」和「火」的部位那六年中，人世間的穀物成長會有一年「旱」，也就是鬧「乾荒」；歲星運行一周天——十二年，人世間必然出現一次大「饑饉」。類似的言辭在越絕內經中也曾見過，計氏說：「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飢（應該是「饑饉」的「饑」，不是「飢饉」的「飢」）。」兩處記載，文辭雖然不盡相同，說的却都是對「農業穰毀循環說」的一項綜合敘述。換句話說，這些文辭只把前述「故歲在金，穰；……」，或「太陰三歲處金，則穰；……」的道理，用另一種方式加以說明。其實，其中並未包含任何新意，目的只不過要引起下文而已。

這裏，順帶提及：史記貨殖列傳爲了要表明農產收成的好壞，全文中共計用了「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四個相關的辭組。除了「穰」、「毀」、「旱」三組都相同以外，剩下的只有「木某」一組，前者作「饑」，後者作「康」有差異。「毀」、「康」、「旱」等都表示穀物「歉收」，可是「歉收」的程度如何？從三字的字面可看不出來。是「三兩成」？還是「百分之百」？都有可能，計氏可沒有說。可是「饑饉」的「饑」字，表示「荒歉」已經到了「嚴重程度」是可以確定的。兩段文字最後既然都已用了確定的「饑」字，「木某」部分的「某」字，用「康」字應該比「饑」字來得恰當。

第二項——恐慌的預備

爲了應付農業上定期荒歉所造成的恐慌，必須從多方面努力才應付得了。在越絕內經中，計氏說：「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通「殃」，災害）祥。」積蓄物資，目的在於防備天然災害。同書中，計氏又說：「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這是說：「既知經濟循環不可避免，人主必須早作準備」才好。接着更引據湯、禹時代的史實，證明「預備」的實際功效，他說：「故湯之時，比（接連）七年旱而民不飢；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流離失所）。」聖人爲人民有所「預備」，目的就在使「民不飢」；使「民不流」。

在同書中，他又說：「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則易傷，重遲（遲鈍）不可戰。」吳越外傳中，計然也說過類似的話：「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勦其甲兵。」這兩段文字都說蓄積五穀、布帛、金銀等，是備戰的主要工作。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他說：「知闕（知道戰爭必將來臨）則修（謀求；擴大）備（準備）。」意思是，知道戰爭必然發生，爲了贏得戰爭，才肯去作必要的準備。準備的範圍很大，途徑很多，單從財物的儲存、積蓄方面說，自必包括五穀的蓄積，和金銀等財貨的儲存在內。吳越外傳中，有一段記載計然在儲蓄方面的成就，說：「設八倉，從陰（進入「陰」的那年）收著（同「貯」。「居積」、「儲存」的意思）；望陽（盼望進入「陽」的那年到來）出糶。筭（和「策」通，簡冊記載）其極計（最高計量），三年五倍（倉庫儲存穀物的數量增加了五倍）。」這告訴我們，在這方面，計然不僅是經濟理論家，而且是推行經濟政策極具成效的實行家，尤其當年記述經濟方面的成就，已經懂得利用具體數字——「五倍」——來顯示成果，委實不尋常。

在史記、漢書貨殖傳都提到計然主張：「旱則資（和「資」相通，「摩挲謀畫」的意思）舟，水則資車，物（事）之理也。」唐顏師古漢書注：「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這是說：乾旱的災情到達了極頂，明年常會發生水潦現象；水潦的災情到達了極頂，接著乾旱的災情就會到來。因爲這項道理，在乾早年頭，我們不能不早作準備，大量建造船隻；在水災嚴重的日子，就必須著手

製造大批車輛；這些都是通常的事理，怎能不遵守、不作未雨綢繆的打算呢？

說到物資的儲存，計氏也曾有過許多精闢的意見，這裏不妨附帶一說。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他說：「積蓄（同「貯」）之理；務完物（貨物務必要完整無缺）；無（毋）息（停息）幣（同「弊」，「弊病」、「缺失」）；以物相貿易（透過貿易的方式，將舊貨換成新貨）；腐敗而食（易於腐敗消耗效用的物品。食，同「蝕」）之貨，勿留。」都是有關「倉儲」所發表的卓見，直到今天，仍然都很切合實用。

第三項——通習貨物的源流

爲了要減少、或免除水旱災害在經濟上所造成的損傷，在諸多應變的方法中，最簡單、最直接、最快速的就是大量建造倉庫，儲存各項民生物資，以備軍、民應急之用。要曉得，物資的儲存，在財力支應、國防考慮、管理方便等方面有種種的限制，很難達到真正所謂「安全」的標準。這種標準即使達得到，也不能不說是一件不太經濟、甚至沒有必要的措施。從全面解救各地的需要、或應付長期需要的觀點來說，與其大量設置倉庫，不如採取「有無相達」、「貨暢其流」、「藏貨於人」的辦法來得根本。從施政者的立場去看，保證全民所需物資供應無缺的基本辦法中，首先要做的一項就是「通習源流」。

什麼叫「通習源流」？用現代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對「貨物」的「生產」、或「集散」的「源頭」，以及進行「貿易」、「運送」的「管道」、或「流程」，所有有關的「資訊」，加以「通盤」的瞭解——瞭解一切的「常數」；並且切實「掌握」——掌握所有的「變數」。

在越絕內經中，計然說：湯、禹時代，連年災荒，可是人民「不飢」、「不流」。完全由於「其主（統治者）能通習（完全知曉）源（貨物的產地、或集散地區所在）流（指運輸、或交易管道），以任賢使能（因爲任用了賢能的原因），則轉轂（以車輛運輸）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不能通盤貨物的源流），則百里之內，〔貨〕不可致也。」「通習源流」的目的，在於使「千里之外」、「百里之內」的貨物都能夠到來。如果「不習」它「生產」的「源頭」，以及「貿易」的「流程」，雖在「百里之內」，貨物也難於「招致」得來。所謂「貨」自「千里之外」而來，說的應該是「諸侯國際間」的「貿易」；所謂「百里之

計然其人其事及其思想

內」，應該是指「本地」、或「國內」其它地區。這幾句是說，「資訊」的取得，對「貿易」的順利進行，關係十分重要。「聖君」所「任用」的「賢能」官吏，必須完全瞭解物資「生產」、和「集散」地區的季節、數量、品質、價格、限制……等等；「運輸」、「貿易」的「流程」，包括運輸工具、交通狀況、關梁障礙……等等；以及交易場所的設置、管理，和交易租稅的徵收……等等；所有有關的「資訊」，都不能沒有充分的知識，都不能不作適當的對應措施。只有如此，所需要的「物資」才有源源而來的可能，才會解決、或減低天然災害、或戰爭動亂帶來的一切困擾。

第四項——通暢貨源，增加收益

「通習源流」的目的，在於使「千里之外」、「百里之內」的貨物可以流通，也就是說：「貿易能夠順利（通暢）進行」。

在越絕內經中，計然說：「夫人主利源流（使貨物來源順利通暢），非必身爲之也。虛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訂定合理價格，通暢市場交易），而來諸侯（招徠諸侯，建立友好關係），守（有效推行）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給與報酬，以成其事），傳其驗（紀錄上述有關事項的成效）而已。」

這段引文中說到的「利源流」、和「爲之命以利之」中兩個「利」字，指的應該是同一件事。一般說來，「利」有兩種解釋：第一，當「順利」、「通暢」講。所謂「利源流」、和「以利之」，就是「使貨物源流通暢」的意思。「源流」怎樣才能「通暢」？前面已經說了一些，但主要的話要留在第五項——「維持貨物的合理價格」中再說清楚；第二，當「利益」講。所謂「利源流」、和「以利之」，就是透過「貿易」的途徑，增進本身利益的意思。說到「利益」，牽涉的範圍非常廣闊，並不完全限於「錢財的收入」；其它如：甲、計氏文中說的「來諸侯」，就是透過「貿易」的途徑，和「諸侯國」間建立友好的關係；乙、使人民在「免於飢寒之苦」以後，具備「守法度」的條件；丙、貨物經過「關梁」、交易在「官市」中進行，都有租稅可收；丁、進行「平糶」、「齊物」、或「更新倉儲物資」等，都可能產生「盈餘」；戊、有了必需的經費，賢臣在聖君的領導下，各項建設計畫才得順利推行；上面由甲至戊這五項，都是因爲進行貿易才獲得的「利益」。還有，政府施政有了足夠的財源作爲支援；君王的雄心壯志，

有了厚實的經濟作為基礎，才有「成其事」、「傳其驗」、創造歷史奇蹟的可能。

第五項——維持貨物的合理價格

在自由經濟制度之下，要貨物交易能夠暢通，必須具備三項基本的條件：甲、當地必須是個最好的消費市場，也就是說這個地區對某項物資的需求非常強烈；乙、某項貨物在這裏，可以賣到很好的價錢，也就是說，必定能夠獲取較多的利益；丙、除了繳納租稅之外，不再有意想不到的貿易障礙。

在春秋晚期，越國雖然位居偏遠，又處在強吳的陰影籠罩之下，但由於國君勸精圖治，臣民勤奮不已，不數年間，已經從殘破中崛起，成爲一個新興的開發中國家。在軍事、經濟等方面，正大力推展建設工作。又因爲採行獎勵人口的政策，「令壯者無取（娶）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不遵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之古訓。有違於「育民」義務的履行）；將免（免乳）者以告，公令醫（乳醫）守之。生丈夫（男子），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乳母）；生二人，公與之餼（食）。……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到宗廟禱告先君）。」（見於國語卷二十、越語上。吳越春秋卷十勾踐伐吳外傳也有類似的記載）人口急速大量增加，生產、教訓的工作更廣續進行。但限於本身的幅員，「南至於句無（句無亭，在今諸暨縣境），北至於繁兒（今嘉興餘興兒鄉），東至於鄞（鄞縣，舊稱寧波），西至於姑蔑（今太湖），廣（東西爲廣）連（南北爲連）百里」（見國語卷二十、越語上），腹地十分狹小，除了民生基本物資還勉強可以不虞匱乏、並多有儲存之外，其它軍民所需特殊物資，仍然需要仰賴國外的進口。

越國的發展，既然依賴通暢貨物的貨物源流，就不能添加任何人爲的障礙。就招致「千里之外」、和「百里之內」的貨物而言，剩下來就只須在「官市」之中，「維持貨物的合理價格」一項，如果在這方面做得不出差錯，也就是說一切不違背交易上的習俗、常規，自可達成「貨暢其流」的目的。現在鈔錄計然在這一方面的有關言論如下：

在越絕內經中他說：「甲貨之戶曰：黍（稷的別稱，是百穀之長）爲上物，賈（價）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穀物名，俗稱黃小米）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上等米穀）令爲上種（做種用的上等稻粟），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

計然其人其事及其思想

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穰（芒粟，也叫梁，野生）比（比擬）蔬食（蔬食，指草木的實），故無買（價）；辛貨之戶曰：菓比蔬食，無買（價）；壬、癸，無貨。」從上引文字，可知穀物中，從價格上去衡量，梁（穰）和黍地位比較高；稻和麥地位比較低。這裏所列舉各種穀物的售價，說的應該都是通常情形下的數字；在市場中的實際售價，因爲受供求需要的影響，必定有上有下。

越絕內經中計氏說：「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指「人主」）所擇者（列入大量採購計畫中的貨物），則無價（價格升高，不可計算）矣。」這是說，朝廷需要的物資，數量必定可觀。市場需要遽增，貨價陡漲自然不可避免。某項貨品一旦列入政府大量採購的範圍；或者採購計畫既已擬定，很難再作更張；在這種情形下，價格上揚必然漫無止境。這段話說的仍然是貨價高低和需求殷切與否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关系。

貨物價格一般而言，遵循「供求需要的升降」作自然的調節，誰也不能對它作長期有效的控制。物價只要不暴漲、暴跌，上落如果有相當的限制，對生產、供應、消費者三方都有利益。

在史記貨殖列傳，計然說：「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商賈）。末病，則財（財貨）不出（生產）；農病，則草不辟（除）。上（穀價上限），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意思說：每逢豐年、或到了收穫季節，穀物每擔只賣二十錢，必然嚴重減低農民收入，甚至不敷生產成本，不但會使農民生活發生困難，並且可能打擊農民來年的生產意願。每逢荒歉年頭，或青黃不接時期，穀物每擔售價九十錢，農民因存穀無多，必然惜售；商賈由於買氣旺盛，貨源驟減，交易稀少，收入必然大幅低落。如果對穀價設定售價的限制，規定上限每擔不得超過八十錢；下限每擔不得低於三十錢；農民和商賈就都不會遭受過大的損失，各自的利益都能獲得保全。

這種對穀物售價設上下限的辦法，可以免除人民遭受過分的痛苦；可以使政府在經濟事務方面，利用由稅租等方式得來大宗物資作斂散、輕重的措施，對貨價作干預，應該不以「穀物」爲限，其它「民生必需物資」如布、帛等，不會不包括在內。從「平糶齊物，關（關梁）市（官市）不乏」（見史記貨殖列傳）兩句，可以知道，除了「平糶」之外，還有「齊物」一項，和「平糶」同等重要。還有所謂「不乏」的「關梁」，和「不乏」的「官市」，這兩項設施，對當年「貿易」的進行、所產生的作用，也不難想像得知。

※

※

※

計然在經濟思想上的貢獻，既如上述；那也難怪范蠡在輔佐越王、擊敗吳國、滄雪了往年所受的恥辱之後，深深嘆了一口氣說：「計然之策七（「七」字係依史記貨殖列傳，若依漢書則作「十」），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當初計然所獻的計策一共有七項，越國只採用了其中的五項，便已實現了越王的願望。越王既能把這些施行於國家，范蠡自然也照樣地如法泡製把它們運用到治家理財方面，於是乎成爲當代的商業巨擘。

引用參考書目

左傳 先秦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民國四十四年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

國語 先秦左丘明撰，吳韋昭注，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戰國策 西漢劉向集錄，東漢高誘注，民國五十一年八月世界書局影印讀未見書齋重雕本。

史記 西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藝文印書館影印乾隆四年校刊本。

吳越春秋 東漢趙曄撰，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越絕書 東漢袁康撰，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越絕書校注 民國張金城撰，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漢書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藝文印書館影印長沙王氏虛受堂校刊本。

皇覽 魏劉劭、王象等撰，清孫馮翼輯錄，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影印問經堂叢書本。

魏皇覽 魏劉劭、王象等撰，清黃爽輯錄，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影印黃氏逸書考本。

太平御覽 宋李昉編，民國六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南宋蜀刊本。

先秦兩漢經濟史稿 民國李劍農撰，民國七十年十二月華世出版社影印本。

先秦儒家自由經濟思想 民國侯家駒撰，民國七十二年十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排印本。

中國經濟思想史 民國侯家駒撰，民國七十一年七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排印本。

中國上古經濟思想史 民國唐慶增撰，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古亭書屋影印本。

中國歷代財經思想與政策 民國林伏濤撰，民國五十四年二月中國建設出版社排印本。

